

冲决名教的羁络

——阳明心学与明清文艺思潮

潘运告著



· 冲决名教的羁络

——阳明心学与明清文艺思潮

潘运告 著

责任编辑：周志平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 32开 印张：12.5 字数：320000

1999年11月第1版 199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5355-3061-3/G·3056

定价：18.0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1988年前我就想写这本书。由于湖南人民出版社答应列选我的另一本书，即《从老子到王国维——美的神游》，只好将此书搁起。不久我担负出版社的领导工作，自然无暇顾及此书了。我退休后又想写此书，但此时此类经济上亏损的学术著作很难被出版社列选，我此书提纲寄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后亦如此。后我忙于为湖南美术出版社主编“中国书画论丛书”，又将写这本书的念头搁起。1997年初，当“书画论丛书”第一辑开始出版发行、第二辑尚未着手编撰之际，一日我偶过湖南教育出版社，动了探望任立社长的念头，两人晤面，未及数语，老任即允诺出版此书。这使我满心喜悦，回家立即动笔，夜以继日，一连5月，赶写完此书27万余字。

我之所以念念不忘写此书，自然是因为我感觉到此书值得写。明清文艺思潮，实则是明清文人思想潮流，它不同于先秦诸子争鸣，也不同于魏晋文人的放达通脱，它表现出有着某种早期人文主义的性质。在晚明，呈现出一股热情奔放的浪漫文艺思潮，其代表作是《牡丹亭》、《西游记》和“三言二拍”中一些作品。《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其内容、题材和描写方法，都是近代的。其中对性交场面那样无节制无掩饰、长篇累牍、赤裸裸的描写，有着作者对荒淫糜烂性行为的鞭挞和批判，也流露出作者的某种欣赏和赞美。作者这种矛盾心态，是那一历史时期性解放的社会现实的扭曲了的变态反映，有着冲决程朱理学禁欲主义的积极一面。这种浪漫主义到了清初以后，由于清统治者的严酷统治和压迫而转为感伤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然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没有变，只是由于现实的黑暗，情绪显得感伤而悲凉。如《红楼梦》对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自觉地展开了批判，然又看不到

光明和希望，没有出路，贾宝玉最后遁入空门。

这股明清文艺思潮，一般以李贽为发端，我则由李贽而上溯到王阳明，因为李贽的思想实则由王阳明而来。过去由于思想简单化，把王阳明贬损为主观唯心论，因而讳谈他的杰出理论贡献。今天仍有人认为王阳明尚不及朱熹，以为朱熹尚有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王阳明则一切都归结于心。这不仅不了解王阳明，亦不了解朱熹。在朱熹那里，宇宙论服从于伦理学，宇宙规律完全等同人世伦常秩序。王阳明不满于朱熹的，正是朱熹这种把天理和人心分而为二，因而将天理移置于人心，将朱熹的理本体改变为心本体，以之建构他的心学体系。他并不排斥或否认见闻之知。他曾明确告诉他的弟子，见闻之知可以通过见闻、学习去求得；只是他建构他的心学所要解决的不在此，而在德性之知，即致良知：怎么能简单地把他贬损为主观唯心论呢？王阳明心学的一个突出特点、价值和贡献，是将天理移置于人心，道心要通过人心来体现，良知要顺应自然，这样使道心与人心日渐相混同，与人欲日渐相混同，从而逐渐走向了自然人性论。阳明心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价值和贡献，是主知行合一，知必须行，良知无不行，“行之明觉精义处即是知”，强调主体实践的能动性和自觉性，从而激扬起一种个体“自作主宰”的主体意识和独立的人格精神。阳明心学的这两大特点，就发展成为明清文艺思潮的思想理论基础。

就以此为序。

1999年7月4日于麓荫园

目 录

自序	(1)
绪论	(1)
上篇 明清早期启蒙思潮的发端与发展	
第一章 王阳明,明清早期启蒙思潮的先导	(12)
第二章 王艮,走向近代思想转型的先驱	(27)
第三章 何心隐,挣脱名教羁络的勇士	(40)
第四章 焦竑,一位博学而激进的学者	(54)
第五章 李贽,批判儒家纲常名教的英勇闯将	(70)
附 李贽的美学思想	(88)
中篇(上)晚明文艺思潮的杰出人物	
第一章 徐渭,明清文艺思潮的先驱	(104)
第二章 汤显祖,主情的伟大戏曲家	(118)
第三章 袁宏道,公安派的主将	(132)
中篇(中) 明末清初文艺思潮的杰出人物	
第一章 冯梦龙,主情的通俗文学家	(149)
第二章 张岱,明清之际的散文家和学者	(162)
第三章 傅山,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	(181)
中篇(下) 清前期文艺思潮杰出人物	
第一章 洪昇与孔尚任,清初两位杰出戏曲家	(199)
第二章 蒲松龄,清初杰出的文学家	(215)
第三章 吴敬梓,杰出的讽刺文学家	(229)
第四章 曹雪芹,伟大的文学家	(241)
附 《红楼梦》的思想倾向	(255)

下篇 明清文艺思潮的几种表现形态

第一章	明清文学中的艳情小说·····	(267)
第二章	举世传诵的明代民歌·····	(280)
第三章	不拘格套的明清小品·····	(291)
第四章	从《四声猿》到《桃花扇》的戏曲·····	(308)
第五章	从徐渭到李渔的曲论·····	(322)
第六章	从李贽到脂砚斋的小说评点·····	(337)
第七章	从袁宏道到袁枚的诗论·····	(357)
第八章	从徐渭到郑燮的画论·····	(376)

绪 论

此书写明清文艺思潮，不起于李贽而起于王阳明，实起于王阳明也。李贽的思想，固然对明清文艺思潮产生了极大影响，然对明清文艺思潮产生极大影响的尚有徐渭、汤显祖。汤显祖亦甚推崇李贽，徐渭则早于李贽而逝而不知有李贽也。徐渭、汤显祖同李贽一样，皆王门后学，故谈明清文艺思潮的思想理论基础，不能不由李贽而上溯至王阳明之心学。本书为明晚明文艺思潮入清后的流变，便下延至曹雪芹、郑燮和袁枚，因为从他们的作品中，明显地看到徐渭、李贽、汤显祖及袁宏道的影响。

阳明心学的时代特色

哲学是时代的灵魂。阳明心学是那个时代的心声。

明中叶以降，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这在东南地区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这一地区的新兴城镇不断出现，市井平民阶层空前壮大，并形成具有群体联系和自觉要求的利益集团。工商活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广大工匠反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日益高涨，表现出农民起义之外的一种反封建的新力量和新领域，不会不引起社会的注意。不仅如此，有的还强烈地震撼着官府乃至朝廷作出反应。万历年间苏州纺织工反孙隆的流血斗争，就是如此。时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兼管税务，“无赖尽投入其幕，奉札委为税官”，加重盘

剥，“民不聊生，汹汹思乱”^①。织绉工葛贤为首倡义抗税，众皆响应，除孙隆潜逃杭州外，苏州诸税尽皆杀之，且焚毁其室庐长物。起义工人又“不挟寸刃，不掠一物”，焚毁税官室庐时，又“預告乡里，防其延烧”^②，既显示了工人群体抗税的强大威力，又表现了早期工人集体的道德风貌和严明纪律。后道府下令捕诸为乱者，葛贤为保护群众，遂“挺身诣自首，愿即常刑，不以累众”，连官府亦觉“其愤激之情可原矣”^③。神宗也只得下诏：“苏州府机房织手，聚众誓神，杀人毁屋，大干法纪，本当尽法究治。但赤手空拳，不怀一丝，止破起衅之家，不及无辜一人……原因公愤，情有可矜，召祸奸民及为首鼓噪者葛贤等八名，着……正法具奏，其余胁从俱免追究，以靖地方。”^④这次工匠抗税斗争，虽然葛贤为首的八人牺牲了，却向社会各界显示了工人群体的力量。连最高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说他们“大干法纪”而杀其为首者，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赤手空拳，不怀一丝，止破起衅之家，不及无辜一人”的合理性。

像这种工匠反抗封建剥削与压迫的斗争，在苏州、南京、松江、上海等地不断出现。这种斗争在震撼着社会、震撼着官府乃至最高统治者的同时，不会不震撼思想文化界，促使思想家进行严肃的思考，作出理性的判断。《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就有这方面的记载：

阳明子曰：“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

① 文秉《定陵注略》卷五。

②③④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一。

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

他的这段话在理论上作了明确的表述：“四民异业而同道”，士农工商在“有益于生人之道”上，“则一”也。并由此对儒家传统的歆士荣宦游而卑农耻工贾的思想表示不满，予以指责：“自王道息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骛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实则他是要打破传统观念对于士农工商的“本末”之见，为提高工商应有的社会地位张目。

更重要的是他从哲学本体上立论，为工商及整个下层百姓的社会伦理地位张目。如他肯定“满街人都是圣人”的论断，就是如此：

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倒看你是圣人在。”

又一日，董梦石出游而归。见先生曰：“今日见一异事。”先生曰：“何异？”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①

这里的“满街人”，当指市井平民为主的下层百姓，其中当然包括工商。因他的哲学以心为本体，以良知为本体，又认为人生来良知具足，不管圣贤与愚凡都是如此，故肯定其弟子所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并由此而提出：“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②这无异于宣布那些自视天生比普通百姓高贵而鄙弃他们的人为邪恶。进而他还明确提到商贾，“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③。

当然，他这是就人人天赋良知具足的整体而言的，若具体到每个人讲，你要成为圣人，情形则又不同。你得“致良知”，即

①② 《传习录》下，黄省曾录。

③ 《传习录拾遗》。

“存天理，灭人欲”。他毕竟是理学家，在这一点上与朱熹同。因此他说：“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①“为学”，就是致良知。所以他又说：“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②一者能致其良知，使“心纯乎天理”；一者不能致，这就是圣愚之所由分别之处。不过，虽然如此，他从哲学本体论上为下层百姓、为市井平民、为工人商贾应有的社会伦理地位张目，这则是与朱熹理学的不同处。这正是明中叶以降那个时代的心声，由此而有后来的黄宗羲的“工商皆本”的论断。

阳明心学开启一个时代

王阳明在为工商及下层百姓的社会伦理地位张目的同时，更开启了一个时代的新思维和新理念。明清文艺思潮中那些新的思想概念，几乎都发端于王阳明。

如平民意识，即由其“满街人都是圣人”及“与愚夫愚妇同的便是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便是异端”的论断发端而来。虽然他此论并不否认“圣凡之分”和“贵贱之别”，但肯定了“圣凡”、“贵贱”天赋同有“道心”、“良知”，由此才有王门后学的平民意识。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王门之高足也，他提出：

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③

把“百姓日用”提高到与“圣人之道”相等同，并以此为正统，“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承其师说而又在转换其师说。到

① 《传习录》上，薛侃录。

② 《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③ 《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

王艮之三传弟子何心隐，提出“君臣友朋，相为表里”，把君臣、父子、夫妇、昆弟的伦理关系和纲常等级的地位降低，而突出友朋关系的作用。他希望通过这种关系，“以朋得朋，以友得友”，从而“聚天下之英才，以出仁政”^①，通过君王而覆盖天下百姓，将平民意识及民主意识表述得更清楚明白。到李贽这位王门后学的杰出代表，则完全把“圣凡”看成是平等的了。他说：“人但率性而为，勿以过高视圣人之为可也。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②又说世人只知“夫妇之不肖与能”，而不知“圣人之不能”；有些事“圣人所能者，夫妇之不肖可以与能”，“夫妇所不能者，则虽圣人亦必不能”：因此“勿下视世间之夫妇为”，“勿高视一切圣人为”。李贽在这里已没有以圣化凡的伦理要求，表述的是圣凡平等的思想概念。然这种平民意识又由阳明发端而来。

又如主体意识，发端于阳明就更明显。阳明心学以心为体，心又以知为体，知即良知也。良知强调凡事要自知，他说：“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③又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④这些阐发主体意识的话，叫人想起徐渭的“本色说”、袁宏道的“性灵说”、李贽的“童心说”和他那大无畏的非孔教言论，如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⑤ 阳明心

① 《囊桐集》卷三，《辞唐可大愧》、《与艾冷溪书》等文。

② 《李氏文集》卷十八，《明灯道古录》上。

③ 《传习录》上，徐爱录。

④ 《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⑤ 《焚书》卷一，《答耿中丞》。

学的主体意识更体现在“知行合一”，强调“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①，激励王门后学勇于实践自己的“主意”。王艮为宏扬自己的学说四处奔走讲学，“务使人人获所而后已”^②；何心隐倾其家产组织社会基层的组织“会”，使全会的子弟皆能就学，以致为宣扬自己的学说而死于反动派的刀下；李贽更是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③，终被统治者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迫害而死；及焦竑为学反对禁锢重主体，提出“学道者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和明清之际刘宗周、黄宗羲、傅山不畏死难而坚持民族气节，皆可谓这种主体意识的表现。

再如情欲意识，王阳明对此自然是持否定态度的，然在理论逻辑上为其后学留有演变发展的广阔余地。他虽不断讲“去人欲，存天理”，但把“天理”移置于“心”中，就使“道心”与“人心”共存一体，彼此不可能析而为二，道心不可能离开人的血肉之躯而存在。故他说“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④；并指出“心之本体”之乐，“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⑤，喜怒哀惧爱恶欲“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认得良知明白”，便“不可分别善恶”^⑥，这就肯定了人的正常欲求的天然合理性。故王艮提出“百姓日用是道”^⑦，把百姓的日常用度提到道的高度。何心隐则明确提出“寡欲”以“存心”，“而心不能以

① 《传习录》上，徐爱录。

② 《遗集》卷一，《书壁示诸生》。

③ 《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④ 《传习录》下，陈九川录。

⑤ 《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

⑥ 《传习录》下，黄省曾录。

⑦ 《年谱》。

无欲也”^①；辩驳程朱理学的禁欲说教。李贽则进一步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②，把“穿衣吃饭”当作人类普遍存在的常情常理。并由此而直言不讳地言“私心”：“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③ 汤显祖作为戏曲家，为其戏曲写情而提出“主情说”，并将“情”与“道”并列起来，说：“道心之人必具智骨，具智骨者必有深情。”^④ 此“情”自然包括“欲”，道心之人必有的。虽然，这些王门后学有关“人欲”的思想，离其师说已越来越远，“遂复非名教之所羁络矣”，然毕竟是从王阳明肯定人的正常欲求的天然合理性发端来。

其他如徐渭的狂疏傲岸，自然使人想起王阳明晚年不时显露的“狂”气，只是阳明超狂而入圣，徐渭并未想到入圣，而是狂世傲俗。他狂中作《四声猿》，使他“终老缝掖，蹈死狱，负奇穷，不可遏灭之气，得此四剧而少舒”^⑤。又狂中画《雪压梅竹》，并题词：“云间老桧与天齐，滕六（古代神话中的雪神）寒威一手提。折竹折梅因底事？不留一叶与山谿！”世道如此不平，一提之“与天齐”，一折之“不留一叶”，故“其感慨激烈之意，悲于击筑，痛于吞炭”^⑥。又如王门后学多讲“率性而行”，这自然又使人想起王阳明关于“率性”的论述。阳明讲“率性之谓道，便是道心；但着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意在行道心而抑人心。王门后学如袁宏道（受李贽影响很大）讲“率性”，意在“惟真”，“任其自然”，反对名教羁络，追求思想自由和个性

① 《焚桐集》卷三，《辩无欲》。

② 《焚书》卷一，《答邓石阳》。

③ 《德业儒臣后论》。

④ 《睡庵文集序》。

⑤ 钟人杰《四声猿引》。

⑥ 张汝霖《刻徐文长佚书序》。

解放^①。总之，王门后学的思想观点追本溯源，皆发端于阳明心学，当然皆有了极大的全新的发展。

王门后学与明清文艺思潮

阳明心学通过王门后学而有全新的发展，也通过王门后学而给明清文艺思潮以强大的影响和推动。其中影响最著者，当推徐渭、李贽、汤显祖及袁宏道四人。

徐渭从两方面发挥其影响力。一是戏曲，以其《四声猿》的创作开启了明清浪漫文艺思潮的先声。汤显祖读《四声猿》后赞佩不已，曾语卢氏李恒峤云：“《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② 汤显祖的浪漫主义的戏曲创作，受徐渭影响甚深。沈璟是另一位受徐渭影响的戏曲家，其喜剧《博笑记》开场词《西江月》：“昭代名家野史，于今百种犹饶；正言壮语敢相嘲，却爱诙谐不少。”这不与徐渭《歌代啸》之开场词《临江仙》同一情调吗？徐渭的戏曲创作及其理论，还影响了王骥德、吕天成、李渔等人。二是绘画，徐渭擅长花鸟，兼能山水、人物，水墨写意，气势纵横狂放，不拘绳墨，笔简意浓，形象生动；常于画幅题写诗词，借题发挥，抒发对世事的愤懑，对后世影响很大，开启了明清水墨写意的新途径。清代的朱耷、原济，扬州八怪中郑燮、李鱣等人，皆受其影响。

李贽在当时的影响，主要是思想理论上的。他那新颖的思想理论，像朝日之东升，照亮了周围的士人。如焦竑，《明儒学案·文端焦澹园先生竑》说他，“笃信卓吾之学，以为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门第二席”。如汤显祖，自说“见以可上人之

① 参见《记药师殿》、《识张幼于箴铭后》等文。

② 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

雄，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纳，如获美剑”^①。可上人，闻达禅师；李百泉，即李贽。汤显祖的思想，对其影响尤深者，是民间王学的人民性、李贽的指斥道统和可上人的勇猛无畏。如袁宏道，对李贽更是在师友之间。袁氏兄弟在公安柞林初见李贽，便认为李乃“大奇人”，后袁宏道得李贽书，即作《得李宏甫先生书》诗，备致倾倒之意，中有诗句：“似此瑶华色，何殊空谷音。悲哉击筑泪，已矣唾壶心。”自此李袁间之诗文多矣。此外，李贽对戏曲小说的评点，影响亦极大，如其为《水浒传》作序并对《水浒传》进行评点，就直接开创了明清小说评点之学。金圣叹因偏于保守而曾辱骂李贽^②，然其评点《水浒传》的思想仍由李贽发端而来。

汤显祖则以其戏曲创作和“主情说”影响了那个时代。其受影响最巨者可推冯梦龙，他在戏曲创作上本受沈璟的影响而属吴江派，而在主情说上却与汤显祖一脉相承。他编纂《情史》并为之序说：“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这里“情”真成了宇宙的本原了。洪昇、孔尚任亦甚受其影响而突出写“情”，两位杰出戏曲家，特别是洪昇，首肯别人称赏他的《长生殿》“乃一部‘闹热’《牡丹亭》，世以为知言”^③。在伟大作家曹雪芹身上，亦有汤显祖的影响，在《红楼梦》里塑造了一对光彩照人的有情人，且在第二十三回专写宝黛二人偷看《西厢记》和《牡丹亭》，还特别写出黛玉读《牡丹亭》的感受：“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庚辰本有脂砚斋的眉评，揭示曹雪芹写此一情节的意图云：“情小姐故以情小姐词曲警之，恰极当极！”

① 《答管东溟》。

② 见其评点《水浒传》第三十一回夹批。

③ 《长生殿例言》。

袁宏道是公安三袁的代表，公安派文学运动的领袖。在明代中后期文坛停滞不前之际，他以进步的美学思想和超群出众的才思，推动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文学运动。他作为这一文学运动的推动者和领袖，有三点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反对复古模拟；二是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推崇“从自己胸臆流出”^①的诗文；三是倡导向民歌学习，他自己的诗文就多通俗畅达。钱谦益是很有些看不起晚明文学革新派的，也不得不承认：“中郎之论出，王、李（后七子首领王世贞、李攀龙）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濬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②但由于倡导向民歌学习，公安末流也就难免不流于“俚俗轻浅”，于是一些保守文人也就竞相起而诟病。这样就出现了以竟陵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标举“幽深孤峭”以为宗，以补公安“俚俗轻浅”之不足。然竟陵派仍保持了“独抒性灵”之论，可见公安派的“性灵说”之深入人心！清初复古思潮重又沉滓泛起，然也仍有主“道性情”的，如尤侗。他说：“诗之至者在乎道性情，性情所至，风格立焉，华彩见焉，声调出焉。”^③但在当时复古风气极浓之际，他不同情复古，也不偏向“性灵派”，说：“若夫今之诗人，矜才调者守历下、琅邪为金科，凿性灵者尊公安、竟陵为玉尺。”他取中立态度，因而以为“两者交病而已”^④；不过他主诗“道性情”，就属公安派的思想。到袁枚，则明确标举“性灵说”，并引王阳明语云：“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髫肃揖，自有佳致，若

① 《叙小修诗》。

②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稽勋宏道》。

③ 《西堂杂俎》三集，《曹德培诗序》。

④ 《杂俎》一集，《蒋虎臣诗序》。

带假面，伛偻而装须髯，便令人生憎。”^① 强调诗文要有“真意”。不过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了袁宏道的“性灵诗”的经验，顾及到对“性灵诗”的各种批评，这样重新标举“性灵说”，就务使其理论显得完备而周全。如重天分而不废工力，尚自然而不弃雕凿，主师心而不忘学古，等等，力求扬性灵诗之长而避性灵诗之流弊。

徐渭、李贽、汤显祖及袁宏道四人推动和影响了明清文艺思潮，集中体现在他们提出了重要的美学概念。如徐渭的“本色说”，李贽的“童心说”和“化工说”，汤显祖的“主情说”，及袁宏道的“性灵说”，都是在明清文艺思潮中广为流传和使用的。徐渭的“本色说”，有着“情真”和“语俗”两方面的含义，是对戏曲创作提出来的。“情真”与汤显祖主“情”相通，“语俗”则揭示了戏曲这一市民文学语言通俗化的特色。李贽的“童心说”即“真心说”，真心、真情是文艺的生命和本质特征，故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②。“化工说”是指文章浑然天成，真实地反映生活和描绘审美客体，不见人为做作之痕。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李贽赞赏《拜月》、《西厢》，提出了这一概念，后被人用来评点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汤显祖的“主情说”和袁宏道的“性灵说”，皆意在有真情，只是侧重不同。汤重在戏曲，作者要有真情，还要写出戏曲中人物的真情。袁则重在诗文，作者要“独抒性灵”，这样诗文才有个性，才有独特的风格。袁宏道同汤显祖、李贽、徐渭一样，都是顶天立地、独来独往的人，作文章讲究自我作古，不拾别人半点牙慧。他们这种思想，可说都由王阳明的“心本体论”及主体意识而来。

① 《诗话》三。

② 《童心说》。